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

尚書

書 孔氏傳

在帝堯聰明文思先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翼善傳
 下同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遜遷也
 古帝堯若順稽考也堯典言堯可為百曰放勳欽明文
 思安安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富安
 者○四方往反注同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
 備謂允恭克讓先被四表格于上下允信克
 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
 溢四外至于天地納皮寄反爾晉問本亦
 作問音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
 祖玄孫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
 之親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
 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乃命羲
 衆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
 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



中華書局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

尚書 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尚書/(唐)孔穎達等撰. - 北京:中華書局,1998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

ISBN 7-101-01920-X

I . 尚… II . 孔… III . 中國 - 古代史 - 三代時期 - 史籍 IV
.K221.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19893 號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

尚 書

(全三冊)

[唐]孔穎達等撰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179 1/2 印張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2,000 冊 定價:294.00 元

ISBN 7-101-01920-X/B·301

前言

先秦所傳習《尚書》，由秦博士伏生傳授至漢代，是為西漢伏生今文本二十八篇。其所傳弟子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本，又增加了後得漢代偽《太誓》，成為二十九篇。此立於學官的伏生一系三家今文二十九篇本沒有傳下來（唯《漢石經》殘石傳下歐陽氏本經文二十篇中的殘文八八六字。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則先賴有馬、鄭古文本襲用，其後又賴有偽古文本襲用，雖文字有不少改易，然二十八篇基本篇章獲以傳下）。

西漢出現《古文尚書》，最初為孔子裔孫孔安國家藏本，後經種種渲染與傳說，習稱此本為孔壁本，據傳比今文本二十九篇多「逸《書》」十六篇。此入藏皇家中秘稱為孔壁本的多「逸十六篇」的真古文本也沒有傳下來（劉向《別錄》載中秘本古文五十八篇，蓋古文家將逸十六篇析為二十四篇，加今文本二十九篇析為三十四篇，共計五十八篇）。

東漢出現杜林漆書古文二十九篇本，此本有一大問題：稱為古文，却没有應該有的壁中真古文逸十六篇，反而祇有同於今文之二十九篇篇章，不過字體為古文之本。傳其學者有東漢幾位古文名家，至東漢後期，這一系統的馬融撰《古文尚書傳》，其弟子鄭玄撰《古文尚書注》，皆將原二十九篇析為三十四篇，是為「馬鄭古文本」（此本標榜為孔壁本，

鄭《書贊》稱其書共五十八篇，以附會劉向所稱孔壁古文本篇數。然實止三十四篇，故稱「注」三十四篇、「述」二十四篇篇目以弥縫之。其「二十四」，即以逸十六篇中之《九共》為九篇而成。鄭玄注本於魏、西晉及北朝皆立於學官，普遍傳習。（另有王肅注本，亦於魏、西晉立於學官，且比鄭本佔優勢，然至北朝未立）。由於東晉出現偽《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將二十八篇析為三十三篇，偽撰二十五篇）之本，承傳至南朝，亦皆立於南方學官。隋統一經學，承用南學而廢北學，鄭學式微，然至唐初陸德明撰《釋文》時，馬、鄭本及王肅本猶存，其後始完全失傳。（由於《魏石經》刻鄭玄本經文，今殘存其中十七篇經文二千八百三十四字，宋王應麟、清孫星衍有馬、鄭注輯本）。

由是祇有東晉的偽《古文尚書》傳世，偽孔本成為《尚書》一經的正統本，故本《注疏叢刊·尚書》遂從偽《孔氏傳》開始。

偽孔本《古文尚書》作為官定本傳至唐代，詔孔穎達撰《尚書正義》以闡釋經文和傳文。這一系統是學術史上屬於漢學範疇之本（偽孔本十三卷五十八篇，《正義》二十卷五十八篇）。

宋學興起，不滿漢學，祇重視文字訓詁、器數名物，而欲根據理學以闡釋經義，以弘揚「先聖心法」。於《尚書》遂有朱熹弟子蔡沈承師命撰《書集傳》，為六卷五十八篇。元、明、清

三代定為官學，各有補充、闡釋《蔡傳》之作數十家。其著者元有陳櫟、董鼎、陳師凱、鄒季友等；明亦多家，除王樵外無佳本。其官定擴充本胡廣《大全》，全出剽竊，尤劣；清代官定擴充本有康熙、雍正時命王項齡主纂的《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全錄《蔡傳》而補充資料不少，很有用。這一系統是學術史上屬於宋學範疇之本。

宋代學者具有獨立思考精神，因此對「孔氏傳」偽古文本開始展開疑辨。最初為吳棫以伏生之書難懂、「孔氏」之書易懂疑其偽，接着鄭樵、洪邁等皆有疑偽之語，而以朱熹為疑偽大家，其《語類》中有疑偽孔及《書序》之語四十多條（不過他最後怕「倒了六經」，不肯「一齊不信」）。繼者趙汝談、丁鉉、陳振孫、王柏、王應麟、金履祥亦皆致疑。其中陳振孫始考定今文、古文之別。元初趙孟頫之書遂開始把今文、古文分開來編。至吳澄《書纂言》盡去古文，祇釋今文二十八篇，斷然認定二十五篇為偽書，是宋學的疑偽古文到元吳澄纔前進了堅定的一步，他指出偽二十五篇「採集補綴，無一字無所本」。啓發清儒追索其「所本」以揭露造偽真相。王充耘《讀書管見》辨偽尤多精論（如揭露《大禹謨》及「三聖傳授心法」之偽）。明梅賾《尚書譜》和《尚書考異》代表疑辨史上進到一個重要階段，不祇是停留在文字難易的區分上，而是創始運用搜集證據的方法，一是文獻的證據，二是歷史事實的證據，其科學性大大提高，清代閻若璩、惠棟的科學考辨完全遵循梅賾這兩項研究方法而取

得辨偽的徹底勝利。明代疑偽古文有名者尚有張燧、鄭曉、顧應祥、歸有光、羅敦仁、吳炯、郝敬、鄭瑗、焦竑、胡應麟等人。以上諸多疑辨偽古文著作，以吳澄、梅賾二人之書為有力之作，王充耘、羅敦仁（《尚書是正》）二書有精到見解，郝敬（《尚書辨解》）鄭瑗、（《井觀瑣言》）二書亦深有影響。通過這些學者的努力，偽古文的問題揭露得相當清楚了，水到渠成，祇待清代學者來把它徹底推翻了。清初顧炎武有辨偽之語，姚際恒、錢煌有辨偽之著作，方素北、馮景、朱彝尊有辨偽之篇，閻若璩、惠棟二位辨偽大師之後有宋鑒、唐煥、王懋竑、李紱、楊椿、程廷祚、崔述、崔邁、丁晏等皆有辨偽之名作，而以閻若璩集大成，其《尚書古文疏證》運用梅賾所創造的研究方法，經過數十年的縝密考證，鐵證如山地推翻了偽古文。惠棟《古文尚書考》為閻氏充實了材料，使閻說更完善，為僅次於閻氏的又一部力作。總之如果沒有自宋至明的考辨成就，就不會有閻、惠的研究成果。然而有閻、惠特別是閻若璩的著作，纔使疑辨偽古文運動克奏全功。本《注疏叢刊·尚書》選擇了閻若璩之書為疑辨偽古文學術成就的總代表。

清學主力專承閻氏之說，進而對保存在偽孔本中的今文二十八篇作了整理研究。首先是吳派學者，吳派宗師惠棟的門生江聲撰《尚書集注音疏》，專搜集和注釋漢代《尚書》的古文資料；用功三十五年成書的王鳴盛《尚書後案》，專宗鄭玄，對東漢古文學派及其

傳衍的經說搜羅無遺。此二書專釋二十九篇（二十八篇加自輯漢代資料成的《太誓》），給後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再就是皖派，提供了詳核的考訂和優異的論斷。其創始者戴震有意全面整理《尚書》今文而未成，僅成《堯典》（包括《舜典》）一篇（書名《尚書義考》）。此派大師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專考校由今文二十八篇析成的古文三十一篇（二十八篇中《盤庚》分為三，並析出《康王之誥》），解決漢時《尚書》的文字句讀困難。又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四種訓詁專著，對解決經籍識字審詞問題為前無古人之文字學成就，其《讀書雜誌》、《經義述聞》中關於《尚書》的專卷，成了研究《尚書》文字的準繩。故皖派段、王之作，為清代《尚書》研究最成功的部分。其後吳派學者孫星衍綜合採用上述諸家的成就，撰《尚書今古文注疏》，意以為過去孔穎達為偽古文傳注作疏，他則為漢代今古文傳注作疏。而後清代後期今文學派紛紛為《尚書》撰寫著作，其中以魏源、陳壽祺、陳喬樞父子、王闈運、皮錫瑞之書為著，陳喬樞《今文尚書經說考》、《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及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尚書大傳疏證》為尤著。陳喬樞《遺說考》三十四卷，盡量搜集西漢今文三家資料，首先錄段氏《撰異》資料，接着搜集文獻中其它資料，比段氏書豐富，有此一編就可基本掌握文獻中所有漢代今文資料。皮氏《考證》主要特點是大量採用漢碑及漢人著作資料及段、陳偶未採及的文獻資料。最後還有清末古文學派的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及簡朝亮《尚

書集注述疏》。王氏書全釋偽孔本五十八篇，為其特色。簡氏書力求復馬、鄭古文本二十八篇之舊，附清人所輯漢《太誓》一篇，務採漢古文家之說，過於繁瑣，段落不清。清末另有桐城派古文學家亦撰有不少《尚書》著作，佳作為戴鈞衡《書傳補商》、吳汝綸《尚書故》、《寫定尚書》及其子吳闓生《尚書大義》。姚永樸、馬其昶、王樹枏等亦皆有佳作。此派能擺脫漢學經師塵霧，直接涵味經文，又能吸收馬、鄭之所長，並學會王引之父子對虛詞、語法的辨認，對文句的揣摩較深切，因而其分章分句較妥當。解釋文義較明晰，但都是較簡短的篇幅，無長篇巨著。關於《尚書》的清學主要情況有如上述，要著名著不少，不能盡行採用。現按各學派擇其有代表性者，吳派取江聲、孫星衍，皖派取段玉裁，今文派取皮錫瑞，古文派取王先謙，以見偽古文被推翻後，作為整個學術界在各個歷史時期進行《尚書》研究的總成就。

以下對入選於本《注疏叢刊·尚書》類的九部書逐一作出簡略的介紹：王念孫、王引之《大戴禮記》、偽《孔氏傳》本《古文尚書》，於東晉初年由豫章內史梅賾獻上，冒充為西漢孔安國家所藏孔壁本，並偽造了孔安國為每篇所作的傳（即注）和在全書前面偽造了孔安國所寫的序。因為劉向說孔壁本《古文尚書》共五十八篇，所以也把本書東拼西湊成五十八篇，即襲用了馬、鄭本古文中所錄存二十八篇今文所析成的三十三篇（即馬、鄭本二十九篇中

去《太誓》，而分《堯典》下半為《舜典》，《皋陶謨》下半為《益稷》，《顧命》下半為《康王之誥》，《盤庚》分為三篇，以成三十三篇之數。又偽造二十五篇假古文（中有新偽造的《泰誓》），湊成五十八篇之數。自漢以來各篇之序皆總為《書序》一篇，附在全書之末。如果照錄為一篇，則全書為五十九篇了，不合劉向所稱孔壁古文之數，因此把各篇之序分散開來，按時間先後附在各篇之首或尾，以保持全書五十八篇之數。為明晰計，現將今文、偽古文各篇列明如下：

今文二十八篇析成的三十三篇：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漢今文此篇在《呂刑》前）、秦誓。

偽古文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

既然說是孔壁真古文，就必須有「逸十六篇」，無逸十六篇，就必非真古文，這是鐵的事實。可是造偽者不知有此，却從所傳「百篇書序」中找了十九題，編造為二十五篇，其中祇有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伊訓、咸有一德、武成、旅獒、冏命九個篇題偶在「十

六篇」中（另有今文中分出的《舜典》、《益稷》也在逸十六篇中）。這是最明顯的造偽之迹，可以立判其是非，可是當時誰也沒有注意到這點，祇覺得這部《古文尚書》篇章很完備，以為真是孔安國所傳之本，高興地接受了它（不知孔安國是漢代今文博士，當時有嚴格的家法師法，是必須遵守的嚴格紀律，不許稍有背離，孔安國根本不可能背離家法去傳古文，歷史資料也記載得很明白，孔安國根本沒有傳古文，祇把家藏的一部古文寫的《尚書》獻給了朝廷。偽古文作者利用這點牽強附會地栽誣他傳注了這部偽《古文尚書》）。

這部偽古文雖是偽書，但它保存了真實的今文二十八篇，這在學術上是一大功。它總結和承襲了在《尚書》方面漢代經學的全部成就，益以魏和西晉以來各種經說，着重把古文家所推崇的聖道王功貫穿在全書經文和傳注中，同時加進了自己時代所需要的東西，即：（1）懲於王莽、曹丕及司馬氏都利用《尚書》中堯舜禪讓及周公踐祚故事篡奪政權，因而特別強調維護封建綱常，反對鄭玄注周公稱王之說，而必說周公稱成王之命以誥，以君臣上下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2）盡力宣揚堯、舜、禹、湯、文、武有一脉相承的道統，編造一篇《大禹謨》說舜把從堯那裏所受的道傳授給禹，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句，被儒家稱頌為「三聖傳授心法」。這對儒家哲學理論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宋代理學一稱道學，即從「人心」、「道心」十六字心法傳衍而出。由於此書在樹立儒

學道德說教中有着如此重大作用，還由於此書不像西漢今文經學漫無邊際受方士神學陰陽五行乃至讖緯妄說影響的神秘而空疏的雜說，也不像東漢早期古文家衛宏、賈逵等故意和今文家立異而造作的古文說，而能對每章每句都加以梳理、條析，用簡潔的文字做到每句都有解釋，幾乎達到當時今譯的地步。這在《尚書》學上是一個超越以前一切著述的最優異的成就，是魏晉經學中的佳作，因此為人們所樂於接受。孔穎達《尚書正義》序說此書「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道出了當時人們對此書的贊美之情。大家一方面高興於它經文的完整，一方面喜歡它訓注的明晰與釋義的弘雅，就把它看成是漢代出於孔壁的「真古文」和孔安國的真注釋。再經過王朝的提倡，各代都立於學官，作為國定課本傳習，於是這部出於東晉的冒牌《古文尚書》，就取得《書經》的正統地位，一直傳到近代。

這部偽古文為了表示它是「真」古董，還創用了一種偽古體文字叫「隸古定」，除少數摹寫真正的古字外，絕大多數是稀奇古怪的字體（如「始」作𠂔，「會」作𠂔、𠂔，「專」作𠂔，「戰」作𠂔，「諸」作𠂔，「辟」作𠂔，「使」作𠂔等等，還有多達幾十筆的不可名狀的字）。從東晉初年偽古文出現之日起，直至唐天寶以前，所流傳通用的《尚書》，就祇是這種隸古定書寫之本。這種字不便閱讀，晉范甯曾用楷書改寫，但至唐初失傳，故唐玄宗於天寶初年命

衛包又以楷書改寫，後刻為《唐石經》。這種隸古寫本在流傳中發展成兩種不同本子：一是從晉到宋齊傳下來的奇字尚不是極多的本子，陸德明稱為「宋齊舊本」；又一是比上一種時間稍晚，到隋唐時已廣泛流傳的奇字很多的本子，陸德明斥為「穿鑿之徒」所為，段玉裁稱它為「偽中之偽」本。當時誤認「宋齊舊本」為《尚書》真本，從晉至唐天寶前一直使用着。這就給《尚書》版本留下不少隸古定唐寫本，一部分唐時由日本留學生帶回日本保存下來，並產生了不少日本抄寫本；一部分藏在敦煌石室，清末由西方文化掠奪者斯坦因、伯希和盜往倫敦、巴黎，柏林也盜藏有吐魯番出土的一本，東京也盜藏有和闐出土的一本。近世始再從他們那裏取回這些文件的照片，羅振玉影印了不少。至奇字太多的「偽中之偽」本，宋代猶有流傳，薛季宣為此本撰寫訓解，成《書古文訓》一書，清代把它刻入《通志堂經解》中，是唐以前已流傳的隸古奇字本偽《古文尚書》保存至今唯一的一個完整的刻本。顧頤剛師與顧廷龍先生合力搜集所有隸古寫本及《唐石經》與其他石經殘石並薛氏刻本，合纂為《尚書文字合編》巨帙，原於一九三六年由北京琉璃廠文楷齋摹寫木刻基本完成，對日抗戰事起未及印出，直至近年由廷龍先生繼續加工，於一九九六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唐玄宗命衛包改寫之本，由於衛不懂文字學，改錯了不少字，但從此作為官定本，以

《唐石經》刻為範本傳下來，五代後一切版刻本皆直接間接承自《唐石經》。此有錯字之本遂為共同誦讀之本，流傳至今。

此書現知有五代刊本三種，北宋刊本六種以上，南宋刊本二十餘種，明刊本二種及其翻刻本二種，清刊本十四種，現代刊本六種，日本刊本十八種。其在國內現存佳本有南宋余仁仲本、相臺本、王朋甫本及三種纂圖互注本、明永懷堂本、清代有翻刻相臺五經本等數種。上述諸本中，纂圖互注三種之南宋坊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尚書》，劉氏嘉業堂藏有一部，《四庫標注》稱其「甚精整」。張元濟喜其「雕鏤精雅，通體完善，單注本之至佳者」，取以影印入《四部叢刊·初編》中。本《注疏叢刊·尚書》即採用《四部叢刊》本影印。

(二)、孔穎達《尚書正義》，係因唐太宗為了給從漢至隋的經學做一總結性的整理，特命孔穎達主持這一項對五經的大整理工作。原命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等共五人撰《五經義訓》，書成，孔穎達等人定書名為《五經義贊》，最後唐太宗改名為《五經正義》，經博士馬嘉運指出其中有錯誤，至唐高宗永徽二年遂命于志寧等人加以修訂。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舊唐書·高宗紀》語）。從此孔穎達主持編纂的這部《五經正義》就為明經考試所必遵，成為天下讀書人必恪守的經典了。

其中《尚書正義》本所釋的是偽孔氏傳本，當時鄭玄注古文本與偽孔注古文本同時存在，由於承用隋統一經學取南學廢北學的成規，錯誤地採用了偽孔本而廢棄了鄭玄本，這是學術史上的一次大失誤。由於上文提到的偽孔本的優點，使他們誤認為這是孔子所編孔安國所注的真古文，所以採用了它。當時南朝出現一種「義疏」之學，繼魏晉時受玄學影響之後，復承受了佛家以義疏講經這一形式的影響，因而也紛紛對「五經」撰寫義疏，這比專講名物、訓詁深入一步，能尋釋文義，故學者樂於從事。故「孔氏」《尚書》自東晉後期迄陳、隋較著的義疏之作共近三十部，北朝後期的隋學者亦撰義疏。孔穎達在《正義序》中說他根據下列諸人義疏：「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猷、費彪、顧彪（皆南朝人）、劉焯、劉炫（北朝隋人）等。」主要用費彪、劉焯、劉炫之說。並說明他撰作態度是：「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必據舊聞」，就是指前人義疏之說；「存其是而去其非」，就是指把南朝義疏中受玄學、禪學影響較多之說去掉，多恢復漢人之說，以保持正統儒學的教義。不過讖緯是漢人之說，因而他亦所採用（歐陽修曾企圖削去《正義》中讖緯之說，未成。其後魏了翁撰《尚書要義》始祇錄《正義》精要之義而去讖緯之說）。自唐《五經正義》後擴展為《九經正義》，於是自漢至唐，經學作了一總的規束，《尚書》一經也就因《尚書正義》而定於一，從此天子士子咿唔咕嗶於此

一書，不敢有違，也不敢他驚了。

此書自唐至北宋一直作專書單獨傳布，北宋端拱二年（989）及其後陸續所刻皆為《正義》單行本（習稱「單疏本」）。直至南宋淳熙間（1174—1189）兩浙東路茶鹽司纔把它和《尚書》本文及偽《孔氏傳》合刻成《尚書注疏》（《孔傳》為注，《正義》為疏），明清兩代把它匯刻在《十三經注疏》（唐代「九經」疏加宋代《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四疏）中，一直流傳到近代還作為常見本流行。

現知單疏本有北宋刊本三種，南宋刊本三種，近代刊本二種，日本寫本四種、刊本八種。現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有北宋端拱間校定、淳化間刻成的《五經正義》監本單疏本，再經南宋初年重刻遞修至紹興、慶元間之本，有大阪每日新聞社影印本，商務印書館又據大阪影印本縮印入《四部叢刊·三編》中，國內另有《嘉業堂叢書》重刻單疏本。現知注疏本有南宋刊本四種，金元刊本三種，明刊本八種，清刊本三種及其各地翻刻本排印本十九種以上，近代翻印宋八行本一種及清刊本五種，日本翻刻、影印、排印本六種，影照本二種。

現日本足利學藏宋越州八行本，原書完整，為天壤間孤本，已由日本政府定為「國寶」珍藏。北京圖書館藏楊守敬自日本購歸宋越州八行本殘本（缺四卷，配日本影宋抄本），又藏金平水刊十三行本（缺四卷，配清代影蒙古抄本），故宮藏宋九行本（缺卷以影刊十行本

補），上海及天津圖書館皆藏宋刻明補板有音釋十行本，又有日本弘化影刻宋越州八行本，皆佳。而以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編定、由著名學者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十三人詳校妥編排印之《尚書正義定本》最精審，這次編印《注疏叢刊·尚書》即以此本為影印底本。

（三）、蔡沈《書集傳》，是代表宋學對《尚書》研究最高成就的一書。自慶曆新學風形成以後，宋學擺脫漢唐經學，建立起自己的經學，有宋一代關於《尚書》的著作近四百家，北宋名作有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曾鞏、吳孜、葉夢得等等之作，南宋有蔡沈、林之奇、呂祖謙、夏僎、鄭伯熊、黃度、陳經、晁公武、張栻、黃倫等等及蔡之師朱熹之作。當時朱熹於諸人中推重王安石、蘇軾、林之奇、呂祖謙四家。另一說朱推重十家（見《書經傳說彙纂》）。王安石由於握政，其《新經尚書義》（與《毛詩》、《周禮》為「三經義」）「頒於學官」，「行於世者六十年」。但遭到反對派的長期圍攻，其書竟失傳。幸有宋、元人著述中引用其說。葉夢得《書傳》日本有傳本。國內唯蘇軾《東坡書傳》保存至今。曾鞏《書說》亦存。南宋諸家之書大都傳下，其中林之奇《尚書全解》為宋學佳作，為《蔡傳》前之宋學重鎮。呂祖謙《東萊書說》亦有名。朱熹本人無《尚書》專著，其《尚書》說皆在其門人所記《語類》中。以上這些為蔡沈主要所承之說，於朱熹死前一年（1169）受朱熹之命撰寫《書集傳》，經十餘年成書，五